

# 西门里天津道署有“恒斋”

——匾额文史之二十七

吴裕成

在桂林,游览靖江王城,会看到三元及第石坊,那是表彰陈宏谋玄孙陈继昌的。距繁华市区不甚远,临桂区横山村,陈氏祠堂楹联“高祖当朝一品,玄孙及第三元”,上联指陈宏谋,他是清雍正元年恩科进士,贫寒苦读而官至大学士,是这个家族科举入仕第一人。

乾隆三年(1738)季春,陈弘谋来任天津道。在津三年,赶上府、县都修志。县志卷首是他的序,所言“自古运会所开,日趋于盛”“比年来,户口倍增,科名林立,而节孝忍恤之行,亦指不胜屈”,讲津地社会和民风。为府志序,“天津拱辅神京,水陆交会,又东邻大海,饶鱼盐之利,四方商贾往往占籍而居”,说区位与经济。

或问,弘谋还是宏谋?他本名弘谋。乾隆名弘历,为臣者要避讳。清刻本《天津县志》该他署名的地方,均署陈弘谋,但笔画五画的“弘”作四画,讳去末笔的一点。乾隆三十二年(1767),致仕前一年,他奏请“恭避御名,改用‘宏’字”。

陈宏谋的职衔,“直隶分巡天津河间等处地方兼理河务布政使司参政”,简称“直隶天津河间道布政使司参政”,其职所司,治河是“主业”之一。

天津道任上,治河(包括排积水)的文稿,陈氏文集《培远堂偶存稿》载有39篇之多。天津府、县志书选刊6篇,包括《南运河修防条约》《子牙河修防条约》《请修天津海河叠道议》等。在其职谋其政,这可不是清谈,那是得实地调查和组织

实施的。

具体运作如何呢?2003年纂修的《天津通志·水利志》中,称他多次乘小船沿河巡视,对南运河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现民间利用“石水斗泥”致河水含沙量大,于是施行“放淤筑堤”之法。他认为此法可行,“力排浮议,率属行之”。上任当年,夏秋两季汛期,即完成20段放淤。他计划,三年内“全河险工皆可放淤成功”。只是因为第三年初夏升任离津,未能完成。清廷对于河工失事治罪很重,南运河又是漕粮运道,放淤之举需勇气担当,还要审慎操作。为此制定“事宜七则”,技术要求、施工方法、抢险措施,均有布置。在任第二年,提出重修海河叠道,也得到《水利志》的积极评价。新世纪地方志的这些评价,应该是专业且权威的。

据陈宏谋《请修天津海河叠道议》,他考察河西岸,从东门外至咸水沽,近河有民埝一道,本已失修,又经上一年大水泛滥冲浸,失去障水功能;另有一叠道,离河岸不远,为“大沽、新城旗民商贾往来之通衢”,虽久坍塌,基址尚存。他建议,参照“遥堤之义”,培修叠道,“既便行人,又可堵水,取土亦易”,并估算了工程费用。

此议,经直隶总督疏报,大学士等议复,被乾隆帝采纳:“依议速行。”朝廷“发帑兴修”,由东门外至咸水沽茶棚。咸水沽以下至新城、大沽口一段,陈宏谋提议“劝捐继筑,一时官、商踊跃从事”。知县朱奎扬组织施工,工竣后有《重修海河叠道记》。经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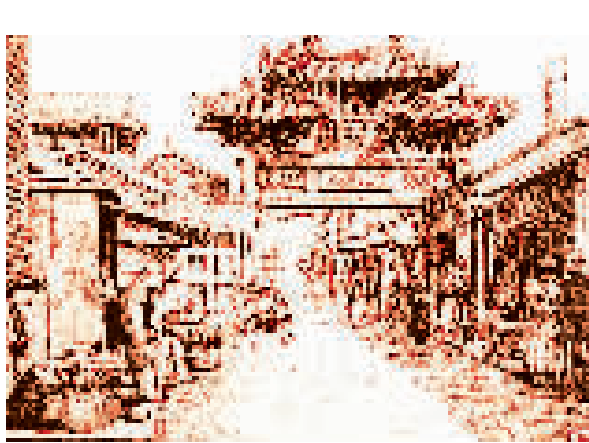
工程,这条曾兼“遥堤”功能的大道,延续至今。“海大道”“津沽路”乃至“大沽路”等,均是关于这条叠道的路名。

陈宏谋诸多天津文稿中,有一篇《恒斋记》是说官署的。天津道衙门本在东门里,康熙时薛柱斗重修,颇有规模,雍正十年(1732)让给总督河道督察院。天津道署迁至西门里大街路北。其处本为天津府同知公署。同知是知府的辅官,级别低些,官署小些。乾隆三年初,陈宏谋的前任张坦熊与知县朱奎扬“奉文添建”,增加三堂后的生活用房。陈宏谋三月份到任后,

接续修建,自捐款项购东隅隙地建书房,“颜其堂曰恒斋”——挂起“恒斋”匾额,并撰文以记。

历来都说“官不修衙”。其心理,主要是“莅官者皆曰,官衙如传舍”,官员流动性大,视官衙如驿站,宁可将就,不作长久打算。陈宏谋不以为然。他写道,修衙并非求“高居大厦以安逸”。他以“靡署者,治事之所”为立论基点,认为视官署为传舍,“一切作苟安旦夕之计”,以“无恒之心”做事,心态消极不可取。

修衙建斋,悬匾著文以明恒心,陈宏谋在天津确实留下不少故事。



## ●老景观素描

### 东门牌坊

张建文并绘

东门牌坊,位于东门内大街。初建于明代万历三年(1575),后在清康熙和民国年间多次重修。它是文庙的配套建筑,上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牌楼由

两根高大木柱支撑,木柱上方为三层横额和雕龙华板,并通过制作精美的斗拱撑起三座“五脊六兽”的阿瓦顶。这两座牌坊不仅是天津仅存的过街古牌坊,同时这种二柱三楼式木结构,亦为其他地方所罕见。

2009年随着文庙的大修,两座古牌坊也实施了落地重建。

家协会。可以说,飞鸽车,在帮我圆作家梦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九十年代,自行车已成为津城一道风景。那时我还算年轻。五十岁的我,曾骑车去参观西青区的石家大院、蓟州区的白塔和独乐寺。我还骑车去过河北省平山县的白洋淀革命教育基地和唐山的李大钊故居。当时,我骑车畅游,既锻炼身体,又徜徉于家乡及周边省市的文化景点中,收获颇多。

记得那时,每到春节临近,我便购买些礼品去看望父母、岳父母,还有老姑。我去给老人们拜年,祝他们新年健康愉快。当时,我要将天津的小八件及江南的水果等老人们爱吃的食品分类包装,扎在

飞鸽车后座上或挂在车把上,然后安全稳妥地推着自行车,给老人们送去。在此期间,那辆飞鸽车也帮了我大忙。

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昔日的飞鸽车也逐渐被人们淡忘。现在的自行车也已今非昔比了。走上街头,我发现有中老年的骑行队,队员们个个装备专业,穿着紧身衣、戴头盔,骑着色彩鲜艳的赛车样式的自行车。他们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运动爱好。还有一些上班族,骑着小黄车、小绿车等共享单车,在上下班时刻,冲锋在市区的大街小巷中。自行车文化,体现了新时代环保、健康和活力的新风尚,为津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采。

## 杨村糕干的传名

曲振明

杨村糕干是武清特产,始于明永乐年间,由杜氏创制,又经后人不断改善,精益求精,驰名中外。检索旧籍,糕干传名颇有记述。

清末武清知县蔡寿臻著《武清志括》云“杨村糕干名京畿间,访之故老,纯庙奉皇太后东巡时进御,太后所赏故名,造自杜姓良”。称糕干闻名于乾隆年间,与乾隆奉太后到山东出行有关,御舟过杨村而进贡,为太后欣赏而闻名。

民国年间,杜姓家人杜赉牲作《杨村糕干制造法》称:“前清康熙

年间,杨村作为驿站,全国举子皆由是进京,购食者莫不称赞,因此名被全国。”即糕干闻名于康熙年间,那时来自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都住在杨村驿站,购食杨村糕干后,无不赞叹,故而名声在外。

《三六九画刊》记,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师生乘火车到津演出,中途停车,听到“糕干、糕干”的叫卖声,武生王金璐称“不用问,一定是到杨村站了”,随后有演员下车购买。由此可见,铁路的开通,又为杨村糕干传了大名。

## 外地画家在津门

章用秀

天津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不少外地的画家曾在此展示才华。

杨天壁(1796-1850),字宿庭,号绿亭,清嘉庆、道光时上元(今南京)人,诸生。工山水、花卉、竹石。杨与天津宿有渊源。天津博物馆珍藏有《水西庄图卷》,此卷分三段,前两段分别为孙雨卿和天津画家陈靖所绘,第三段《津门柳色》即为杨天壁所绘。《津门柳色》作于“道光辛卯”(1831)。图卷中的《海角春帆》出于陈靖之手,亦为辛卯年所绘,由此可知,天津画家陈靖与杨天壁为同时代人,亦可探知在天津,画家们存在交往

及绘画艺术方面的相互影响。

还有一位是安徽怀宁人,名为姜筠,清光绪时举人,官礼部主事。山水专学王翬,笔墨浓重,间作花卉,兼善篆刻。姜筠与善画人物的天津书法家黄宝廉等相友善。姜来天津,“尝主其家”(陆辛农《天津书画家小记》)。而黄与马家桐、赵芷仙等书画家亦有交往,由此姜筠更多了一层与津人接触的机缘。从流传于世的山山水水作品来看,姜还有与尹澹等津门画家的合笔之作。1913年,梁启超在北京万牲园,举办文人雅集,姜筠曾作画记录了这一盛事。

## 知县毛永柏

吴蓬莱

毛永柏任天津知县的时间,其《小红薇馆吟草》诗集可印证。“甲辰首夏,君将之官津门,出其小红薇馆诗集见示”,诗集卷前,方廷瑚撰《叙》写道。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岁次甲辰,距今整整三个甲子。毛永柏又有《小红薇馆拾余诗抄》。

清代地方志记载,毛永柏在津“有惠政”“次年升任去,犹捐廉寄津,以助‘延生社’善举”。官场风气不好,从毛永柏诗作可读到洁身

自好,如《衙署即事》写道:“得俸厨奴催昼食,典衣舆隶怯晨寒。亦知志洁终违俗,敢为名微不惜官。”清者自清,拒绝同流合污,并不容易。任期仅一年,毛永柏能获得好口碑,这或许是其中原因吧。他的《题宁河县麻壁》:“风俗还淳古,歌呼乐太平。最难经历处,共道宰官清。”一句“共道宰官清”,所谓最难,还是在“志洁终违俗”。

毛永柏景物诗,动感的画面撷取:“停桡拟扣酒家扉,帘影风翻出钓矶,春水潺湲流不住,杨花如雪满船飞。”此诗题目为《子牙河棹歌》。

## ●故事天津

### 想起当年的飞鸽车

侯相国

如今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前不久,再骑上那辆已破旧的老飞鸽车,我又找到年轻时的感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行车在普通家庭中是非常重要的“大件”。当时骑自行车,像如今开奔驰、宝马一样威风。当然,其价亦昂,约两百元,顶当时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了。那个年代,自行车虽贵,但供不应求,买自行车需要凭票。我们单位每年抽签抓阄,能获得购车证,真成一件幸运的大喜事。

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我

